

清代人士的明十三陵與景帝陵情懷

朱鴻*

摘要

清朝人士對勝國陵寢的情結，歷代少有。本文以清廷對北京明代天壽山十三陵及金山景帝陵的種種措施，及帝王謁陵有感而發的詩文，以及官民人等的明陵著述與圖繪，探究清代人士多樣複雜的明陵情懷。

清廷以禮葬崇禎為崇禮勝朝陵寢的第一步。全面保護及祭祀明北京天壽山陵寢，順治、康熙時期，對天壽山陵寢著重於保護政策，而非帝王的親自拜謁。乾隆晚年，清帝對明十三陵的崇禮作法有了重大的轉變。乾隆躬謁明長陵，修繕天壽山勝朝陵寢，經金山望景帝陵。清帝尊禮勝朝陵寢的做法，成為了祖宗家法制度，進入中葉季世，國力雖衰，仍以勝朝陵寢為念。

清初對明陵的尊禮保護政策，使士人也能前往故國陵寢致意。其中以遺民表現最強烈，他們將國難之後的故國之思毫不保留的寄託於陵寢，最具代表的人物為顧炎武及梁份。兩人都有對明陵的一手書寫，有志一同的以春秋之義稱崇禎陵為攢宮，對清順治、康熙尊禮明陵的做法絲毫不領情。兩人的著作對天壽山及西山陵寢形勝與規制的記述，為研究明陵的重要史料。時人有雖入仕清廷，然於故國不能無思，如譚吉璫者，也有書寫陵寢之作。與遺民有異，譚氏盛讚順治對崇禎帝、王承恩陵墓的崇禮，以及維護明陵的政策。惟其著書保留一代陵寢規置，絕不多讓顧、梁兩位遺民。由梁氏與譚氏著作手抄本的傳世，當知清廷雖在政策對勝朝陵寢加以保護並禮敬之，然在官員士子間有關明陵書籍的刊行應是有忌諱的。懷故國之思的人，前往北京天壽山西山拜謁明陵，留下詩文，收錄於文集中。值得注意者，清初人士對明景帝陵似情有獨鍾，應是肯定景帝抗禦外族偉業，將對易代外族統治的無奈，寄情於景帝陵。

*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

清代君臣子民的謁陵詩文，不乏是論史之作，而非單純的睹景傷情，清人的明陵情懷可說是歷史書寫的一種表達。清朝的皇帝，特別是乾隆的謁陵之作，是對明朝每個皇帝進行評價論斷，表現的是乾隆「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」的以史御漢的一貫策略。當皇帝藉謁前朝陵寢進行歷史的評斷，官員士子的書寫空間自然會受到相當的壓縮。康熙之後，不再有論述明代陵寢的專著，謁陵詩文的數量也銳減，當由此理解。詩文亡而後圖繪作，乾隆之後圖繪明十三陵，是清代明陵書寫的另外一種方式，圖繪雖可寄情，然不若詩文易於傳播，作用遠不如詩文大。對清人而言，明陵成爲清廷表示對勝朝崇禮的象徵，終清之世都加以保護，並行春秋之祀，具有高度的政治作用。